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
台湾文学『现代性』研究

周

宁

朱双一

主编

现代性与当代台湾文论



Xiandaixing yu
Dangdai Taiwan
Wenlun

刘小新 黄育聪 陈美霞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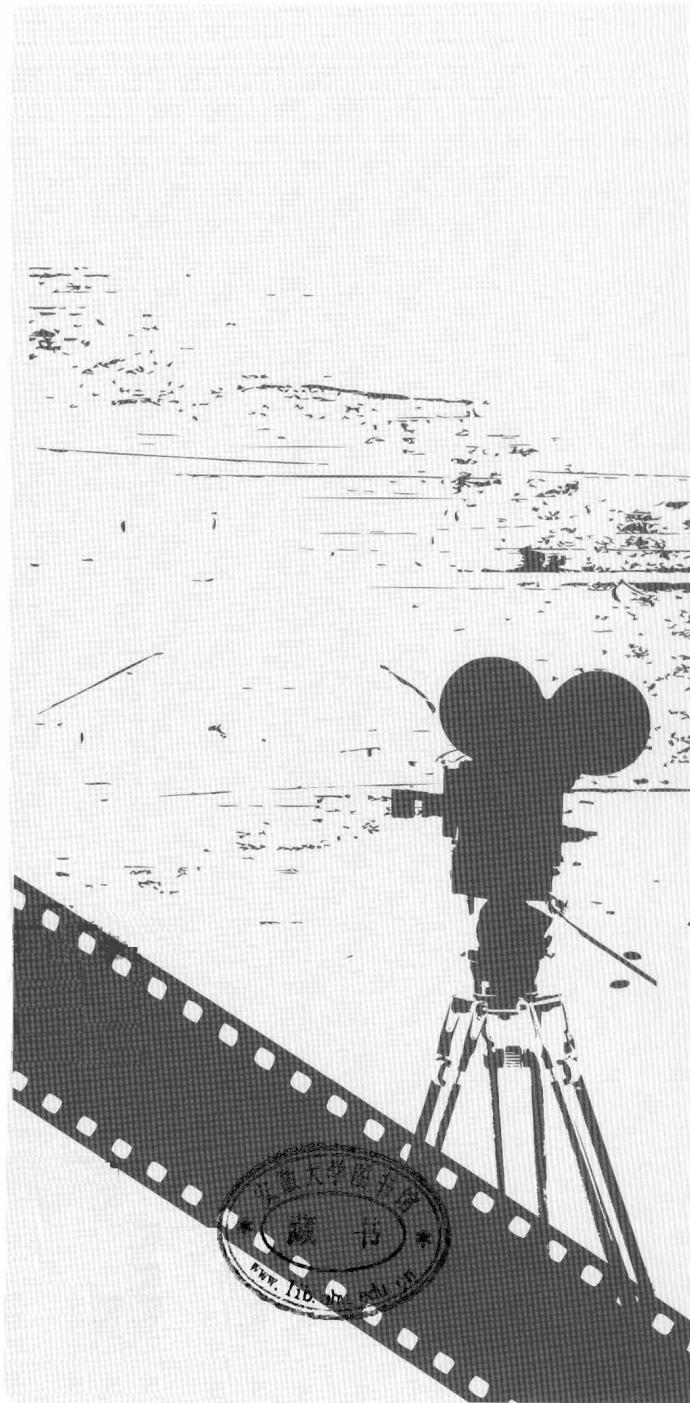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
台湾文学『现代性』研究

周 宁 朱双一 主编

现代性与当代台湾文论

刘小新 黄育聪 陈美霞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与当代台湾文论/刘小新等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7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台湾文学“现代性”研究/周宁,朱双一主编)

ISBN 978-7-5615-5080-9

I. ①现… II. ①刘… III. ①台湾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9.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8916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海望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xmupress.com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20×970 1/16 印张:14.75 插页:2

字数:237 千字 印数:1~1 000 册

定价: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营销中心调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
“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台湾文学的‘现代性’研究”
系列成果之一 项目批准号:05JJDGAT002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台湾文论与“殖民现代性”阐释	14
一、“殖民现代性”概念的缘起	15
二、从“近代化论争”到“殖民现代性”分析	18
三、“殖民现代性”分析与当代台湾文论	25
四、“殖民现代性”的幽灵	34
第二章 重层现代性与台湾文学史重构	41
一、台湾文学史书写现状	41
二、现代性与文学史突围	47
三、重层现代性与传统文人的位置	53
四、重层现代性视野下的歧义	63
第三章 “原住民”论述与现代性反思	68
一、现代性洪流与“原住民”论述的缘起	69
二、“原住民”运动中的现代性反思	73
三、重构文化身份的努力与可能	77
四、走向多元敞开的“原住民”论述	96
第四章 性别论述的现代性维度	100
一、女性主义研究的持续深入	100
二、男性文化研究重审	109
三、边缘性别研究的挺进	113

第五章 医疗书写与现代性	123
一、殖民医疗的规训与反殖民书写	126
二、疾病书写：隐喻与祛魅的两端	133
三、医生书写：人文主义旗帜与发展方向	149
第六章 通俗文学论述与现代性	152
一、古典文学与通俗现代性	156
二、东亚汉文与通俗现代性	165
三、后现代与台湾战后通俗文学	174
第七章 现代性与台湾旅行文学论述	183
一、日据时期旅行文学论述：身份认同与现代性	183
二、当代旅行文学的现代性纬度：大众文化与性别视野	197
第八章 乡土论述：现代性与反现代性	206
一、繁杂的乡土文学定义：意识形态的幽灵	207
二、乡土文学的反殖民书写：新旧文人冲突里的共识	211
三、现代与反现代的纠缠：乡土论述与现代主义	215
四、多元语境下的乡土文学：乡土、本土、台湾	220
参考文献	227
后记	231

导言

“现代性”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非常热门的语词之一，文学理论与批评界也争先恐后地使用这一流行术语。这一现象表明“现代性”问题已经成为当代文论关注的焦点。在《文学与现代性》的学术讲演中，法国学者伊夫·瓦岱援引汉斯·罗伯特·尧斯的说法，“modernitas”一词早在11世纪末就已经出现了。当时，人们用它表示“当代时期”或用以评价文学作品的“新潮性”。^① 在当代思想界，“现代性”已经成为人们反思人类历史变迁和思想嬗变的关键词。尽管，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与界定莫衷一是、众声喧哗，但从总体上看，“现代性”一词还是具有相对稳定的含义：“它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等于工业化的世界。”^② 吉登斯的这一界定与韦伯、舍勒、哈贝马斯等人的阐释大同小异。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现代性体现为神学世界观的衰微，人的主体性的张扬，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理性化以及市民伦理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现代性概念还包含着另一种向度，即指浪漫主义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对工业化和理性化的持续怀疑与批判。

据高远东的说法，在中国文献中，“现代性”一词最早见于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1期。周作人在译文《陀思妥夫斯基之小说》中首次把

^① [法]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田庆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9页。

^②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页。

“modernity”译成“现代性”。20世纪90年代初，“现代性”概念开始进入中国大陆的文学研究领域。1992年，一些热衷于引入“后现代主义”理论并发明“后新时期文学”概念的“后学”论者首先启用了“现代性”术语。在《后新时期文学：新的文化空间》、《继承于断裂：走向后新时期文学》等文中，张颐武、王宁等人尝试用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理论阐释1989年以后与新时期文学的不同特质，他们多次提到与后现代性相对的现代性概念。这时人们并未意识到现代性概念的复杂性，直到1994年北京大学的“重估现代性”讨论，作为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以及社会文化思想现代化进程的现代性概念才逐渐浮现。1996年以来，“现代性”概念大面积进入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甚至成为人们描述和言说百年中国文学与思想史不可或缺的通用术语。人们为什么如此迷恋“现代性”概念，甚至到了言必称“现代性”的地步呢？原因在于：其一，后现代主义的刺激，正如刘小枫所说：“后现代论述的扩张一再返回现代性问题，触发了重新理解现代现象的需求。”^①其二，时间之窗的影响，世纪末人们显然产生了盘点、反思20世纪思想史的冲动，“现代性”问题满足了这种需求。更内在的原因是80—90年代的社会、文化和思想的巨幅转型，人们产生了重新理解与阐释启蒙思想与现代化设计的需求，而西方思想界的现代性论争又进一步刺激了这种反思，“现代性”问题于是凸现在中国知识界面前。

90年代以来，大陆文论界现代性概念的理解与说法有如下几种：(1)“现代性终结论”。认为从五四文学对国民性的探讨到新时期文学的伤痕、寻根思潮，都是“民族寓言的整体话语”，启蒙主义和拯救精神的现代性为文学提供了一种终极价值和梦想。然而，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不再是话语的中心，人们对以往的启蒙神话和知识分子自身的启蒙功能和文化身份产生了怀疑，告别现代性神话成为90年代的文化思潮。因此现代性已经终结了。^②这种说法显然是对西方后现代主义解构宏大叙事观点的搬用。张法、王一川和张颐武在《从现代性到中华性》中认为，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特色是中国的他者化即中心丧失后被迫以西方的现代性为参照以便重建中心的启蒙与救亡工程。在他们的设计中，中华性就成为

①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

② 张颐武：《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8、103页。

解构现代性的构想。^① 这显然是以往中西文化二元冲突的当代版。(2)“现代性未完成说”。这种观点以高远东为代表。他认为：“重估现代性”的要求以现代性的尊严形象遭受嘲弄甚至亵渎的方式提出，启蒙的崇高内涵被揭示为居心叵测的权谋。然而，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尚未有效地建立，启蒙的使命尚未完成。并且高远东从理性—主体神话、启蒙设计中的知识—权力关系、文化等级与进步的观念以及交流沟通与文化归属的悖论四个方面论证现代性的未完成性。^② 从用词与基本观念看，“未完成论”与“终结论”之争酷似哈贝马斯与后现代主义之争的中国版。(3)刘小枫的“关于现代性事件的知识学”，即研究现代现象的现代学。所谓现代现象“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秩序转型”。刘小枫用三个述语描述“现代性”：现代化题域——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题域——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现代性题域——个体与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③ 刘小枫的看法显然借用了齐美尔和舍勒的现代性论述；(4)现代性的分裂与矛盾张力说。汪晖、周宪等人持这种看法，汪晖认为：“从 19 世纪前期直至 20 世纪，现代性一直是一个分裂的概念，其主要表现是作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过程的现代性概念与现代主义前卫的美学的现代性概念的尖锐对立。”^④ 周宪则把现代性的冲突归结为“文化的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的对抗。^⑤ 也有人把现代性的冲突表述为“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分裂与对抗。这些观点来自于韦伯、卡林内斯库、鲍曼等人的现代性论述。汪晖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就是建立在现代性的两重性论述的基础上。^⑥ (5)革命的现代性论。陈建华从阿兰特的《论革命》受到启发，在

① 张法、王一川、张颐武：《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文艺争鸣》1994 年第 2 期。

② 高远东：《未完成的现代性》，《鲁迅研究月刊》1995 年第 6、7、8 期。

③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3 页。

④ 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 页。

⑤ 周宪：《文化的现代性对抗启蒙的现代性》，《粤海风》1998 年第 11、12 期，第 25 ~28 页。

⑥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中，尝试提出“革命的现代性”的说法。

“现代性”概念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影响颇为深远，现在越来越多的学人启用“现代性”概念重新阐释现当代文学。受欧风美雨直接浸染的旅美学学者李欧梵和王德威开风气之先。在 80 年代初，李欧梵为《剑桥中国近代史》撰写的中国文学部分的标题就已经出现了“现代性”：“文学潮流：现代性探索，1895—1927”。他运用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个面孔》的论述阐释五四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五四作家在承袭了西方美学现代性的艺术反抗情绪时，并未放弃他们对科学、理性和进步等信念。这是中国文学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的差异。在《现代性追求：关于中国 20 世纪历史和文学意识新模式的几点反思》中，李欧梵把中国现代性的缘起追溯到晚清时间意识的变化。这启发了王德威对晚清文学的重读。他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一文中，描述了晚清小说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四个层面：对颓废的偏爱，对诗学与政治关系的复杂认识，与理想理性相悖的情感泛滥以及对谑仿风格的倾倒。其结论是：“回溯晚清小说，正是回溯到现代性的谈论及欲求尚未简单化成单一的公式的时期，也是批判性地重拾想象与写作现代的潜在姿态。”^①

90 年代中后期，人们越来越喜欢使用“现代性”概念来描述和谈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问题。1996 年，杨春时、宋剑华发表《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认为：“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完成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转型，它属于世界近代文学的范围；所以，它只有近代性，而不具备现代性。”^②这一观点引起批评界一场关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人们质疑“近代性”一说是否成立，认为：近代性和现代性概念内涵模糊，无论在汉语还是外文，近代、现代、当代并没有什么差异，所以所谓近代性与现代性的区分这一立论前提已经可疑；而把现代性等同于现代主义，用欧美现代主义的标准来判断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就更

①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 1998 年版，第 126、154 页。

② 杨春时、宋剑华：《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学术月刊》1996 年第 12 期，第 85 页。

难令人信服。现代主义不可能决定 20 世纪中国现代性的性质。^① 龙泉明从世界意识、先锋意识、民族意识、人性意识、创造意识五个维度出发，认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具有现代性，只不过这种现代性还不是完整的形态。^② 这场近代性与现代性之争引发了人们探索文学现代性的热情。而“现代性的两重性”、“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以及“民族国家的现代性”等命题的提出，使人们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有了更有趣的理解。以现代性的两重性即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冲突为参照，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母题被归纳为：启蒙主题与民粹主义、个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主题、线性进步主题与现代化主题。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学现代性的悖论。^③ 以现代性的两重性出发，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鸳鸯蝴蝶派”、“论语派”、“学衡派”文学的审美现代性意义；而“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以及“民族国家的现代性”为人们重新阐释革命文学和 1942 年以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野。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认同：“‘民族国家’是‘社会’和‘现代性’的最终表达；现代性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技术同样也在社会经济生产标准化和一体化过程中服务于民族国家的产生。”^④ 如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现代性就好理解了。陶东风则认为：“从现代性反思的视野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虽然是不同于西方启蒙现代性或历史现代性的另一种现代性方案，但是在一些基本的思维方式或‘话语型’上与西方启蒙现代性或历史现代性共享着一些基本的前提。”社会主义是一种现代性设计与工程，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与文学叙事中，在《创业史》、《红旗谱》等小说以及革命样板戏中“无不笼罩着现代性的幽灵”。^⑤

迄今，关于“现代性”与现当代文学关系的讨论，有两个重要问题值得我们关注：第一，“现代性”概念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广泛使用，一方面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思想空间，在它的吸引下，20 世纪中国文学各个层

^① 孙犁：《现代性·近代性·现代主义》，《学术月刊》1997 年第 5 期；陈辽《关于“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问题》，《南京社会科学》1997 年第 4 期。

^② 龙泉明：《近代性，还是现代性？》，《南方文坛》1997 年第 2 期，第 6~9 页。

^③ 伍方斐：《现代性：跨世纪中国文学展望的一个文化视角》，《文艺研究》1998 年第 1 期，第 102~107 页。

^④ 李杨：《抗争宿命之路》，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2 页。

^⑤ 陶东风：《审美现代性：西方与中国》，《文艺研究》2000 年第 2 期，第 17 页。

面的问题都聚集在一起,得到一种整体的观照;但另一方面,“现代性”概念的过度使用乃至时尚化运用,也可能掏空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第二,完整的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论述不能不整合祖国大陆和港澳台文学的历史经验,无疑,台湾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构成了我们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比较两岸文论中“现代性”概念的引入和论述的展开是一项重要而有趣的工作。朱双一曾经指出:“台湾与大陆在文学‘现代性’研究上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值得注意。常有人认为进入当代以来,两岸文学思潮及相关议题的产生和讨论(如现代主义、都市文学、生态环保文学、后现代等等),台湾大多先于祖国大陆。然而‘现代性’议题却倒了过来,明显是台湾受到了大陆的影响和启发。这就说明了大陆和台湾的文学,在经过三十年(1949—1979)的完全隔绝之后,从1979年起出现了重新发现对方,相互交流整合的趋势,其间的影响关系不会是单向的,而必然是双向的。文学‘现代性’研究,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①回顾台湾学术界对“现代性”概念的具体使用,我们认为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台湾的社会心理学界首先对“现代性”术语产生了浓厚兴趣。早在60年代,以杨国枢为代表的台湾心理学学者就开始尝试研究“中国人的传统性与现代性”问题,杨国枢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其“现代心理学中有关中国国民性的研究”和“中国国民性与现代生活的适应”课题的一部分。在70至80年代,在杨国枢、黄光国和瞿海源等人的心理学论述中大量使用了“现代性”和“个人现代性”这类术语,如《个人现代化程度与社会取向强弱》(黄光国、杨国枢,1972)、《中国“人”的现代化——有关个人现代性的研究》(杨国枢、瞿海源,1974)、《个人现代性与相对作业量对报酬分配行为的影响》(朱真茹、杨国枢,1976)、《现代性员工与传统性员工的环境知觉、工作满足及工作士气》(杨国枢,1984)、《传统价值观、个人现代性及组织行为:后儒家假说的一项微观验证》(杨国枢、郑伯埙,1988)、《中国人的个人传统性与现代性:概念与测量》(杨国枢、余安邦、叶明华,1991)……这些文章大多发表于《民族学研究所集刊》。杨国枢等人试图以个人“传统性”和“现代性”概

^① 朱双一:《台湾文学“现代性”研究的提出及回顾》,《华侨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第111页。

念阐释社会现代化演变中中国国民性的变迁，并建构一种可量化分析的“个人现代性”研究模型。

在《中国“人”的现代化——有关个人现代性的研究》一文中，杨国枢、瞿海源如是而言：“现代化历程所带来的后果，可以笼统地分为社会的与个人的两方面。就一个社会或国家而言，现代化所带来的后果，主要有都市化、工业化、民主政治、高教育水准、高科学水准、高国民所得、高社会流动率及有效率的大众传播网等。一个社会或国家如果具有了这些特征，便可以称为一个现代的社会或国家，或者说这个社会或国家具有了现代性。各个社会或国家的现代化历史不同，因而会造成深浅不一的现代化后果，亦即会有不同程度的现代性。另一方面，就单一的个人而言，现代化所带来的后果，往往是一套有利于在现代社会中生活的态度意见、价值观念及行为模式。任何一个人，如果具有了这些心理与行为的特征，便可以称为一个现代人，或者说这个人具有现代性。人们受到现代化的影响深浅不一，因而便具有不同程度的现代性。于是，笼统说来，现代化的历程可以使不同的社会或国家具有不同的现代性，同时也可以使不同的个人具有不同的现代性。”^①这段阐发代表了 70 年代台湾心理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基本理解和认识。概而言之，这种认识包括如下方面：第一，“现代性”是相对于“传统性”的概念，“现代性”是“现代化”所产生的后果，是现代化的表征；第二，现代化的后果可以分为社会的和个人的两个层面，因而现代性也就包括“社会现代性”和“个人现代性”两个层面；第三，因现代化的历史性差异和程度上的不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社会现代性”和“个人现代性”；第四，“个人现代性”程度是可以量化分析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台湾知识界显然把“现代性”视为“现代化”的产物，“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含义基本上是相同的，并没有从中发展出反思现代化的批判的现代性观念。而所谓“不同的现代性”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非性质上的差异，这显然还是一种普遍主义式的理解，与现今“多元现代性”的观念相距甚远。

第二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 21 世纪初年。这一时期，台湾知识界对“现代性”概念的使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亦即转向阐释“现代性”

^① 杨国枢、瞿海源：《中国“人”的现代化——有关个人现代性的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74 年第 37 期，第 2 页。

概念所蕴含的批判性和反思性之维。这一转折可谓意味深长，导致这一转折的原因包括：

其一，后现代主义的出场引发了人们对“现代性”命题的重新思考。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后现代主义的引入，即引起了台湾知识界关于后现代与后殖民的理论论争，也引起了理论界深度思考这样的问题：后现代究竟标示出什么大不同于现代性的新远景？提出什么新的生活方式与伦理原则？^①如此，“现代性”为何就必然成为人们进一步追问的课题。

其二，西方“现代性”及其批判论述开始进入台湾思想界的视域，如海德格尔的批判现代性思想；哈伯玛斯的“未完成的现代性”说；米尔士的“社会学想象”；吉登斯和乌尔利希·贝克的现代性的风险论述……西方思想资源的大量引入打开了台湾思想界反思“现代性”的思想空间。

其三，海峡两岸批判知识界之间的互动激荡了人们对现代性问题的重新思考。2000年，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在《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的发表，引发了台湾思想界的回应，“现代性”概念的批判性意义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与强调。

其四，从根本上看，批判的现代性或反思的现代性论述在台湾之兴起，出于台湾知识界在摆脱了现代化意识形态笼罩之后重新阐释当代台湾史乃至20世纪台湾史的深层次需要。如果说杨国枢等人的“现代性”还是现代化大叙事的构成部分，那么，90年代后“现代性”论述则迈向了反思现代化和批判社会学的现代性论述的新阶段。

在这一转折过程中，“台社”知识分子群体和《台湾社会研究季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某种程度上看，从《“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的“个人现代性”论述到《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的批判社会学“现代性”论述的转变，反映出台湾地区学术思想典范的巨大转移。90年代中后期至2000年，《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发表了一系列涉及反思现代性的重要文章，包括：爱德华·索雅的《后现代地理学和历史主义批判》（1995）、赵刚的《新的民族主义，还是旧的？》、酒井直树的《现代性与其批判：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问题》（1998）、赵刚的《跳出妒恨的认同政治，进入解放的潜力政治——串联尼采和工运（或社运）的尝试思考》（1998）、宁应斌的《威

^① 沈清松：《在批判、质疑与否定之后——后现代的正面价值与视野》，《哲学与文化》27卷8期，2000年8月。

而钢论述的分析——现代用药与身体管理》、萧百兴的《来自彼岸的“新”声——战后初期“省立工学院(省立成大)”建筑设计的论述形构(1940中—1960初)》(1999)、赵彦宁的《国族想象的权力逻辑——试论五〇年代流亡主体、公领域、与现代性之间的可能关系》(1999)、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2000)、钱永祥的《现代性业已耗尽了批判意义吗?——汪晖论现代性读后感》(2000)、赵刚的《如今,批判还可能吗?——与汪晖商榷一个批判的现代主义计划及其问题》(2000)、赵刚的《社会学要如何才能和激进民主挂钩?——重访米尔士的“社会学想象”》(2000)、夏铸九的《殖民的现代性营造——重写日本殖民时期台湾建筑与城市的历史》(2000)……这些论文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深刻地触及反思现代性主题。钱永祥指出:“现代性不仅不同于单纯的现代化,并且由于文化现代具有反思与自我正当化的基本特色,现代性内部其实涵蕴着丰富的批判能量。”^①而赵刚则认为汪晖对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的分析和把握缺乏对“社会性”的“规范性关怀”,这可能导致自身的批判性危机。因为“批判的社会理论不可能在无法维系社会性的可能视野下,仍然保存它批判的民主潜力”。^②赵刚对批判的现代性计划和民主之间的关联性思考委实意味深长,这一思考路径显然是大陆的现代性论述以及现代性批判所未曾深刻触及的。

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这一时期,台湾知识界开始大面积使用“现代性”概念,全面实施系统的“现代性”研究计划,并且确立了“复数现代性”和“台湾现代性”的观念。所谓“复数现代性”,首先是指“现代性”在全球地理空间上是多元的,这一观念是对西方“单一现代性”理念的反动;其次是指“现代性”自身尤其是“台湾现代性”内部本身也是错综复杂的。有趣的是,这一时期,台湾知识界开始给“现代性”概念附加上了五花八门的限定语词,诸如“布尔乔亚现代性”、“党国现代性”、“市场现代性”、“离散现代性”、“殖民现代性”、“反殖民的现代性”、“庶民现代性”、“本土现代性”、“早期现代性”、“土著现代性”、“左翼现代性”、“波希米亚现代性”、

① 钱永祥:《现代性业已耗尽了批判意义吗?——汪晖论现代性读后感》,《台湾社会研究》第37期,第75页。

② 赵刚:《如今,批判还可能吗?——与汪晖商榷一个批判的现代主义计划及其问题》,《台湾社会研究》第37期,第45页。

“创伤现代性”、“医疗现代性”、“另类的现代性”、“超文化的现代性”、“第二现代性”、“现代化现代性”、“依赖的现代性”、“重层现代性”、“翻译的现代性”、“移植现代性”、“压抑的现代性”、“亚洲现代性”、“亚太现代性”、“台湾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韩国现代性”、“第三世界现代性”、“在地化的现代性”、“都会现代性”、“奢华的现代性”、“颓废的现代性”、“空间现代性”、“液态现代性”、“变态现代性”、“旅行现代性”……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表明“现代性”概念的使用在台湾学界日渐广泛,以至于有些泛化了;另一方面却也表明台湾知识界已经认识到“现代性”概念的复杂性和暧昧性,人们意识到,对“现代性为何”问题的回答必须转换为对“谁的现代性”以及“怎样的现代性”的追问。作为社会发展的方案与设计,“现代性”无疑会嵌入地理空间、性别、种族、阶级、族群以及市场、资本与美学意识形态等历史的与现实的种种因素。多元的、异质的以及相互重叠,乃至冲突的“现代性”状况也就诞生了。我们认为,对“现代性”概念的不同界定或限定,表征着台湾知识界在理论立场和对历史的理解上存在着诸多微妙的分歧。

2000年以来,在当代台湾的文学研究场域,“现代性”概念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这一阐释概念的引入和阐发已经产生了一系列富有价值的成果:陈昭瑛的《台湾儒学的当代课题:本土性与现代性》,廖炳惠的《另类现代性》,陈芳明的《殖民地摩登:现代性与台湾史观》,刘纪蕙的《心的变异:现代性的精神形式》,黄美娥的《重层现代性镜像》,陈建忠的《日据时期台湾作家论:现代性、本土性、殖民性》,廖淑芳的《国家想象、现代主义文学与文学现代性——以七等生现象为核心》,朱芳玲的《被压抑的台湾现代性:六〇年代台湾现代主义小说对现代性的追求与反思》,高嘉谦的《汉诗的越界与现代性:朝向一个离散诗学(1895—1945)》,崔末顺的《现代性与台湾文学的发展(1920—1949)》,著名的学院派刊物《中外文学》则相继推出“离散美学与现代性:李永平和蔡明亮的个案”(2002)、“波特莱尔以降——现代性的法兰西观点”(2002)以及“台湾多重现代性”(2006)等专辑,《文化研究月报》组织了“现代性经验”(第40期)、“现代性与文化翻译”(第45期)等专辑,《当代》不甘落后,第221期也推出“台湾文学、医疗现代性与文化视域”的主题策划,内容包括廖炳惠的《台湾文学中的四种现代性》、傅大为的《对“亚细亚的新身体”的一种诠释——从底层与边缘来看台湾的医疗近代性》和黄美娥的《从诗歌到小说——日治初

期台湾文学知识新秩序的生成》……简而言之，“现代性”的引入打开了台湾文学论述和文化研究的空间，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当代台湾文论的范式，甚至重构了阐释台湾文学的理论框架。在“现代性”的话语平台和论述框架上，有关台湾思想史和文学史的一系列课题都获得了重新思考与阐释的契机。

比较而言，两岸的“现代性”论述同中有异，两者都是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展开的对现代化的深度反思。但台湾理论界的现代性论述有其独特的面向和着力点。诸如现代性与民主、“马学”与现代性，“省籍情结”与现代性，现代主义与现代性、现代性与民族主义、现代性与自由主义、现代性与离散族裔的美学政治、“现代性的精神形式”与“心的变异”、现代性与文化翻译等等问题的关联性思考，对现代性、本土性与殖民性的复杂纠葛之分析，对“现代性”概念的越来越繁多的界定，对传统汉文学与现代性关系的辩证，对医疗现代性、旅行现代性的关注，以及对“原住民”文学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思考等许多方面，都体现出台湾地区的现代性论述自身的特点。

本书的讨论集中在当代台湾的文论领域，主要选择以下六大论题来观察与分析“现代性”概念和范式对当代台湾文学论述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第一，殖民现代性与台湾文学研究。1895年至1945年之间台湾被日本帝国所侵占，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地经验，一直都是台湾文学着力书写的主题。一方面，台湾文学深刻地揭示出日本殖民统治的黑暗与残酷，书写台湾人民反抗殖民压迫的精神史；另一方面，台湾文学也不可避免地陷入现代性与殖民性的矛盾与纠葛之中。这种矛盾与纠葛使台湾文学的殖民地经验书写变得异常丰富和复杂，也使得“殖民现代性”成为台湾文学研究不可规避的重要课题。从吕正惠《殖民地的伤痕——台湾文学问题》到夏铸九《殖民的现代性营造——重写日本殖民时期台湾建筑与城市的历史》到张隆志的《殖民现代性分析与台湾近代史研究》，从陈建忠《日据时期台湾作家论：现代性、本土性、殖民性》到交通大学文化研究所刘纪蕙开设的“台湾文化与殖民现代性”课程……“殖民现代性”业已成为台湾人文知识界关注的焦点。本书第一章将梳理台湾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探讨“殖民现代性”问题是如何深刻地嵌入当代台湾思潮的脉动，又是如何曲折地渗入当代文化认同的形塑过程。

第二，重层现代性与台湾文学史的建构。在台湾特殊的历史和政治